

贵州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 黔史纵横

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

---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贵州政协报社 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编委会 / BIANWEIHUI

---

主任：王富玉

副主任：蔡志君

委员：李月成 刘 晓 王晓林 徐 圻 蒙秋明

刘庆鹰 谢 一 周明霞 张燕平

主 编：刘 晓

副主编：方家印 游 涌

编 辑：史 永 郭 军 罗丽华 卢春勤 吴 晓

王 彤 田 野 潘仁魁 平 瑶 靳春华

---

## 《黔史纵横》引出的暇思

(代序)

范同寿

近日得到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和贵州政协报社为纪念贵州建省六百周年特别编辑的《黔史纵横》书稿，读罢脑际一闪，不由触动了对辛亥革命以来历史问题研究方式、方法的一些思索。

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工作中产生的一个专用概念，特指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述，是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自1959年周恩来同志倡导文史资料工作以后，将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根据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撰写出来的文章编辑出版，便成了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由于政协组织联系广泛，与军政、科技、文教、经济工商各界知名人士都有接触，而这些人或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过从甚密，或亲身经历、目睹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阅历丰富。他们以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身份，将所历、所知、所闻撰写成文，便具有了某些历史文献所不具备的直接见证价值，并从一种新的角度，弥补了相关档案资料的不足。这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对中国近当代史的研究，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历来搞史学研究的人，大都习惯于从历史文献中，去搜寻那些足以说明自己观点的论据，即所谓“论从史出”。而其中的“史”，便是自古及今被人们奉为经典的诸多历史文献，“二十五史”自不必说，历代的“实录”、方志

更属学者们离不开的依据，此外便是“通鉴”、“通考”、“图经”之类古籍。如果需要，名人笔记、野史、稗史，乃至诗词都可以成为证实个人学术观点的史源。

古代的大师们，往往侧重于对前人著述的诠释、阐发与考证。是以直到有清一代考据学依然继续兴盛。辛亥革命前后，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开始传入中国，传统的学术考证一类治学，虽然仍广受关注，但在西方资本主义或马列主义熏陶下，一些学者已开始运用各自信奉的理论，按照近代学科分类，从不同的领域观察研究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由此才催生了作为社会科学门类之一的中国近代史学研究。

但凡从事史学研究的人不无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对古、近代历史问题展开阐述的时候，传统历史文献与近代档案资料，是第一手不可或缺、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资料。但若透过相关问题去研究、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以现代史学理念去观察问题时，单纯依靠古人留下的文献却又觉得很不足。尤其研究近、当代中国史问题时，这种不足往往很容易制约学术研究的视野，束缚个人思维。于是，学者们开始将学问的做法，在书斋治学的基础上，引向田野，加进了社会调研、口述历史的研究手段。有人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传统学术研究书桌上的“书本致知”到田野中的“格物致知”。其实，这正是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必然。

有学者提出：田野研究方法是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发生发展的开端，并对现代科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野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标志性方法。田野研究范式的发展为中国的科研带来了新的方式，但这一变化何止与上述学科相关，历史学研究同样离不开田野研究的方法。

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大师们，早已跨出了改革传统研究手段的步伐。王国维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常将“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相互释证；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史学更加入了对“民俗”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史学研究中文献、地下文物和民俗事件的“三重证明”。乐黛云先生认为，“运用‘文献、考古、田野’三重证据，可以更好地诠释、破译中国文化和文学典籍和

众多疑难……”到今天，这样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现代史学工作者的一项学术基本功。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在回答《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提问时曾说：“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要靠证据说话。我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在西方称之为‘历史人类学’。我觉得称之为‘历史社会学’更符合历史学者的研究转型。”他同时指出，由于“历史学是一门领域十分广阔的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这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者自身专长作适当选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9日第402期）。

我们常以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引以为豪，但当代史学研究已经不能孤坐在个人书房中，仅凭冥思苦想立论，单纯从历史文献的爬梳中寻求论据，完成既有一定深度、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论著。即便是讨论与我们时空隔绝很远的历史问题，也需要在研读史籍的基础上，再通过对地面、地下文化遗存的研判，来印证自己提出的学术观点，必要时还必须进行相应的田野调研，从历代相传的口述资料中去提取有价值的参考。

即便如此，历史与它的场景总是无法复制的，这也正是学者们在征引文献时，总是首选历朝“实录”的原因，毕竟它们的成书虽在后世，记述者则主要为当时的亲历者。如果研究近、现代历史问题，档案固然是最具价值的无声文献。但就记述事物的完整性、全过程而言，除了田野调研之外，文史资料应该属于堪与之比肩的重要史料。

就目前这部《黔史纵横》文史资料选辑而论，该书虽为贵州建省六百周年而特别编辑，但全书共分为历史风云、红色史林、夜郎人文、人物春秋、岁月留痕、黔中拾贝六章，计搜入文章86篇，其所涵盖范围，囊括了贵州高原古今史事。而书中相当一部分文章，正是亲历者对往事的回顾。如莫健先生的《忆黔南少数民族武装抗日》、张润之先生口述的《我所经历的解放战争》，另如《央视“讲述”栏目片头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回忆白云区的土改工作》《三线轶事》《记忆中的贵阳大杂院》等，均为亲历者或同时代人的记叙。这

些资料虽不完整，却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相关史事的历史场景。这是我们即使通过实地调研，也寻觅不到的珍贵文献。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特有的政协文史资料，应该不仅是现行政治体制下“三性”（统战性、史料性、可读性）的一种历史保存形式，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史学研究的史料源，也是一种与田野调研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那些亲历者、目击者们的感受与见闻，他们经过思考后所作的如实记录，正好解决了治学者如何复原历史场景与真实的困惑，而这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需求。

是为序。

# 目 录 / MU LU

范同寿 ※ 《黔史纵横》引出的暇思（代序）	01
-----------------------	----

## 第一章 历史风云

---

郭 佳 ※ 贵州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考略	02
朱崇演 ※ 贵州百年前的百年大计	07
喻栋柱 ※ 江西移民与贵州	10
李守明 ※ 南厂新军起义	19
顾大全 ※ “一举足而形势顿殊”	23
陈福桐 ※ 周西成与桐梓系军政集团	26
戴斌武 ※ “五四”运动在贵州的历史轨迹	30
陈棻德 ※ 用笔杆参加抗战	33
庞本驹 ※ 深山里的海军学校	38
何先龙 ※ 松山战役	41
杨志枰 ※ 黔南事变	43
杨晓东	
莫 健 ※ 忆黔南少数民族武装抗日	46

## 第二章 红色史林

蒋兴黔 ※	黎平会议：红军长征胜利的起点	50
陈沂 ※	毛泽东与遵义会议	54
苏士甲 ※	我军在初创时期的军校及教官蒙九龄烈士	58
洪波 ※	建军初期的黔籍将领	64
张治昭 ※	枫香溪会议	68
傅汝吉 ※	遵义苏维埃银行轶事	73
王吟 ※	从赤水至习水追寻闪耀的红色足迹	75
罗兴武 ※	猴场的红军足迹	86
姜丹峰 ※	红军在剑河	89
吴育瑞 ※	红军长征过锦屏	93
苏介华 ※	七星关的红色遗迹	98
王义 ※	红军兵临贵阳过龙里	100
施国俊 李怀昌 ※	红军长征过惠水	104
何维江 ※	红二六军团与“盘县会议”	108
张润芝 唐泽荣 ※	我所经历的解放战争	111
黄辅忠 ※	西进贵州琐忆	119
孟昭伟 ※	艰苦的行军	124
刘昌权 ※	抗美援朝时期余庆的宣传及优抚工作	127

### 第三章

## 夜郎人文

- |              |                |     |
|--------------|----------------|-----|
| 梁茂林 ※        | 沙滩百年树人的教育模式    | 130 |
| 胡长斌 ※        | 遵义文化的历史演进      | 134 |
| 何先龙 ※        | 水东宋氏与贵州文化的发展   | 138 |
| 景戈石 ※        | 思州田氏土司考        | 141 |
| 姜刚杰 ※        | 石门史话           | 145 |
| 何思江 ※        | 鰾国考略           | 149 |
| 文建博 ※        | 鸭溪乐阆古城考        | 155 |
| 班镁光 ※        | 惠水“八番”的由来      | 166 |
| 张永文 ※        | 黎平建府史因         | 168 |
| 王殿华 ※        | 荔波瑶族历史文化和习俗的传承 | 173 |
| 韦毓璋 ※        | 水族南迁考略         | 181 |
| 王尧礼 ※        | 王阳明谪黔遗迹        | 184 |
| 周感芬<br>陆伟霖 ※ | 青岩书院及其弟子       | 189 |
| 杨涛声 ※        | 明清时期黔东的“书院”    | 194 |
| 张体珍 ※        | 清代《百苗图》中的土家族   | 199 |
| 郭正开<br>戴斌武 ※ | 达德学校           | 209 |

### 第四章

## 人物春秋

- |       |         |     |
|-------|---------|-----|
| 吴明泉 ※ | 忆尹珍·看道真 | 212 |
| 廖昌国 ※ | 一代女杰刘淑贞 | 219 |

王路平 ※	贵州划时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孙应鳌	222
胡启涌 ※	天隐禅师与凤冈中华山	229
陈 政 ※	贵州三杰	243
胡启涌 ※	莫友芝与曾国藩	246
庞思纯 ※	千古名臣丁宝桢	249
刘学洙 ※	清末贵州巡抚林绍年	252
戴明贤 ※	贵州新文学三杰	258
李 芳 庞思纯 ※	李家坟与黔籍名士	263
聂舒元 ※	朱启钤与春节	268
李 芳 ※	北伐“文胆”李仲公	272
刘隆民 ※	末代“贵州王”	275
苟克宏 ※	革命的播火者——段雪笙	288
陆景川 ※	杨至成——从黔山走出的侗族上将	291

## 第五章

## 岁月留痕

林顺先 ※	珍藏在锦屏县的《贵州不缠足会条约》	306
罗词安 ※	周西成与贵州汽车银币	310
鲍吉锐 ※	“史迪威公路”在哪里	312
李元明 ※	铜盒砚中的历史	315
曹庞沛 ※	央视“讲述”栏目片头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317
邓大永 ※	忆贵州第一条铁路通车盛典	320
薛林生 ※	蓝布臂章迎解放	324

李 毅 ※	贵阳解放时的《解放快报》	327
白 沙 ※	回忆白云区的土改工作	330
李敬忠 李 星 ※	走进那段火红辉煌的岁月	334
何昭明 ※	“三线”轶事	340
周继厚 ※	贵阳城徽“甲秀楼”	348
王 明 ※	记忆中的贵阳大杂院	351
罗世庆 ※	贵州有多少“怪”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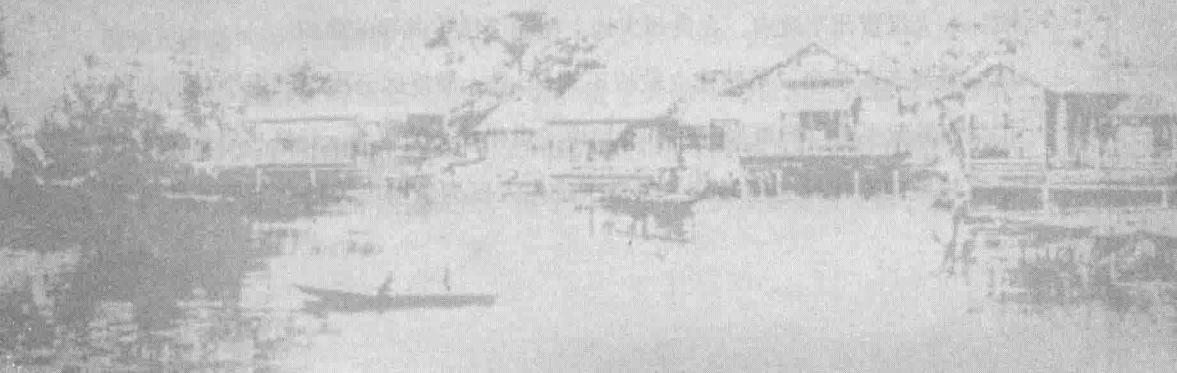
## 第六章 黔中拾贝

叶晓愉 ※	探寻安顺古城墙	372
周山荣 ※	《黔语》中的茅台酒	376
张 蕾 ※	从沈万三到天龙屯堡	378
田维丹 ※	明朝万历年间的贵阳十二景	381
史宏拯 ※	尚书坊与两亭美谈	386
耀家昌 ※	清镇飞机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航空港	389
莫 畏 ※	解放前的铜像台	394
熊代中 ※	湄潭的浙大西迁旧址	396
罗 马 ※	洗冠生与冠生园	400
赵修朝 ※	观山湖区的“关”和“官”	402
刘世杰 程新华 ※	都匀毛尖的故事	406
编后语		413



第一章 / LISHI FENGYUN

# 历史风云





贵州政要在省府梅园合影

## 贵州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考略

郭佳

2011年，是贵州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前，贵州民主革命先行者张百麟、周素园、黄泽霖等领导的贵州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贵州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地方政权，唤醒了被压迫的贵州各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雄心壮志，作为中国辛亥革命的一部分，贵州辛亥革命在西南地区乃至全中国都留下了较为厚重的一笔。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未及一个月，即11月3日，地处偏僻远疆的贵州，继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之后，打响了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统治的第一枪，并随即趁势建立了代表民主共和的新型政府——大汉贵州军政府，在贵州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

贵州辛亥革命，虽然建立政权不到5个月，最终因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入黔扩张而导致失败。但贵州辛亥革命加快了贵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激励了贵州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平等和翻身解

放，实现贵州富强而更加勇敢奋斗。

贵州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贵州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1911年11月3日晚，贵州民主革命先行者张百麟、周素园、黄泽霖等率领以贵州自治学社为代表的革命团体，联合贵州陆军小学、新军、卫队等军事力量，在贵阳首先树起旗帜打响的。清王朝贵州巡抚沈瑜庆，在起义部队向城内开进，无力抗击的万般无奈之下，向起义部队交出政权，承认贵州独立。11月4日早上，起义部队占领各官署，贵州宣告独立，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发布了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公订约法，取消了两千多年来封建政权对贵州人民的残酷压迫。如：见官者一律下跪磕头；一人犯事，株连九族；当权民族天生为优等民族等封建腐朽制度，使民主共和理念逐步深入贵州各民族之中，为贵州各民族的民主政治进步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贵州辛亥革命后经济发展状况。贵州辛亥革命，由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统治贵州的封建地方政权，冲击了清王朝及其地方政权闭关自守的藩篱，贵州经济得以扩大发展。如《开阳县志稿·工业》记载，双流镇农民伍芬照，每年能生产洋芋10万斤左右，县中称为“洋芋大王”，其丰收经验是选用良种，收获季节适宜。他还将洋芋加工成粉，每500斤洋芋，可提取干粉100斤，初值洋钱8元，后涨至25元，当地洋芋百斤3元，利益较厚，粉渣还能喂猪，产品远销贵阳、安顺、独山、广西等地。双流镇附近10里以内之地，经营此业的农民较多，故开阳县每年输出洋芋粉约40万斤以上。又如，由于外国油漆以桐油作主要原料，辛亥革命后，贵州的桐油销路日渐扩大。当时，美国和欧洲各国对桐油的需求量剧增，价格高涨，每百斤可卖50银元，这就刺激了贵州各族农民生产桐油的积极性。贵州辛亥革命后至今，贵州86个县均种有桐子树，并且贵州桐油年产量均保持全国前五位。

贵州辛亥革命对思想文化的影响。由于贵州人民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束缚，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打开了贵州民主共和思想和新文化生活的闸门，如男子剪辫浪潮。满清军攻入关后，强令关中男子的头发要梳成长辫，垂于脑

后，违抗者，轻则打，重则罚。贵州辛亥革命先驱者之一的平刚，因为把辫子剪掉，就受到满清政府贵州地方当局凶狠责打手心四十的惩罚。贵州辛亥革命成功，大汉贵州军政府选派人员到各县接收满清政权后，按照大汉贵州军政府公约之男子一律剪发的规定，未及2个月，省内男子均自愿把长辫剪掉，促进了既方便又卫生的现代男人头饰的推广和流行。

妇女放足风波。贵州辛亥革命前，在男人娶媳妇，首先要看是否是小脚才予顺利迎娶的陈观陋习的影响下，广大妇女被迫包缠小脚。贵州辛亥革命过程中，贵州辛亥革命先驱之一的贵州光懿女学的校长白铁肩（女），首先倡议组织“天足会”推动天足运动，当时的达德、复旦、贞静、蕴贞、育英、崇德等贵阳女校的师生都纷纷迫不及待迅速响应，各县的女学生也迅速起来带头响应，从而带动了贵州广大妇女冲破了陈旧的缠足陋习，使妇女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宽松解放，贵州妇女缠足现象一去永不复返。

破除迷信现象。贵州辛亥革命胜利之前，各地方进步人士为了开通民智，兴办学校。没有校址，无奈只能寻找寺庙祠堂作为校址，而社会上迷信之风盛行，会首和住持都不愿让祠堂作为校址，往往涉讼，影响教育事业。辛亥革命后，这类官司基本上是学校取得胜利，使各地兴办学校、教化智灵得到了广泛推进。

女子教育得到发展。贵州辛亥革命前重男轻女，女子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由于贵州革命党人提倡男女平权，重视女子教育，当时贵州妇女界以白铁肩、黄烈诚、谭弗侠等为首的妇女精英，怀着“从教育入手、争取妇女解放，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志，不仅倡导了“天足”运动，带头破除迷信等，还捐资筹款兴办贵州女子学校。1906年，白、黄、谭创办的第一个贵州女子学校——贵州光懿女子小学开学，截至1910年，这所小学的学生发展至上百余人，这在保守落后的贵州犹如晴天起惊雷，六月降霜雪。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读书识字逐渐成为社会上普遍的现象。

贵州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众多的，不胜枚举的。但从其建立政权后，

不足5月便遭致失败，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反思。

一是贵州革命党人未能真正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虽大汉贵州军政府建立后，选派人员到各县接收了政权，但所选派人员绝大多数都未能真正代表当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在上，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选派人员接管各县满清政权，也只是换汤不换药，从根本上不能求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政权更替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二是在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的联合内阁制中，贵州革命党人采取了与政敌任可澄（普定县人，出生封建望族家庭，19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后又考取内阁中书，在北京官场里混迹一年多，自认未发迹，回贵阳待机发展）、刘显世（兴义地方团练势力头目）、郭重光（贵州耆老会会首）等凶恶政敌携手合作的政策。使任可澄同掌握一定武装的刘显世、善搞政治阴谋的耆老会郭重光等人进一步联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股实力较强的顽固势力，成了颠覆贵州辛亥革命的基本力量。

三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入黔扩张。云南军阀在清朝末年把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作为其势力范围。贵州发生了辛亥革命，并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阻碍了其入黔扩张剥削贵州人民的狼子野心，于是他们在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贵州封建顽固势力的秘密邀请下，不顾贵州革命党人的极力反对，公然以“贵州帮会林立，扰乱社会地方治安，无力维持”为由，在1912年2月29日，滇军参谋长唐继尧率军进驻贵阳，3月2日，唐派军占领大汉贵州军政府各机关，大肆屠杀大汉贵州军政府革命力量，造成贵州一片白色恐怖，少数得以逃生的贵州革命党人和在外黔籍志士，纷纷向中央政府和各省都督呼吁请愿，痛述滇军暴行。云南军阀唐继尧与此同时在贵州封建顽固势力人物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的拥戴下，成立了以唐继尧滇军为首，贵州任、刘、郭等封建顽固势力辅佐的贵州临时都督府。唐继尧主政贵州不到两年，对贵州人民进行了强取豪夺。一是强行在贵州发行纸币150万元，设局加收盐厘，勤借商款60余万，致使贵州在1913年就出现了大量通货膨胀，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二是

开放鸦片烟禁令，增加其扩军筹饷渠道，使深受鸦片烟害的贵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直至1913年8月云南督军蔡锷召回唐继尧后，唐在贵州的封建军阀以统治才得以宽松，但其临走又保举了依附滇军的贵州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以此加深云南军阀对贵州的进一步影响。

四是贵州革命党人没有深刻认识到，反对云南军阀唐继尧和贵州封建官僚的联合政权，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继续，因此与全国的情况一样，提不出反封建、反军阀的政治纲领，更不能提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这是贵州辛亥革命也是中国辛亥革命必然失败的最深刻教训。